

共和国大将的传奇

陈赓大将是中国共产党璀璨星河中光辉夺目的一颗将星。他的一生战功卓著，举世瞩目。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政权建设、统战工作、院校创建、国防科研等各方面勋绩赫赫，而且在秘密情报战线上也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丰功伟绩。陈赓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曾满怀深情地说：“陈赓同志不仅在红军内部，就是在敌人营垒中也是位很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真实的故事和并非臆造的传说，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很有特点、又有教育意义的书。”他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骁勇善战早已为人们广为传颂，而他早年在秘密斗智战线上的累累硕果却不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缺憾。现就有限的资料，把陈赓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传奇经历搜集整理，以飨读者。

1927 年 11 月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 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科。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建立对国民党侦探机关的反间谍工作、尽可能减少叛徒特务给中共中央机关造成的损害，亟需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1928 年 4 月 特科成立了情报科 此举对于推动特科开展工作，打开中共隐蔽斗争的新局面至关重要。情报科的科长一职非智勇双全的大将不能胜任。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慧眼识英雄 亲自点将 使这一历史重担落到了 25 岁的陈赓身上。

此时 陈赓因参加南昌起义左腿负伤 正在上海治疗。他不

顾腿伤尚未痊愈，一瘸一拐地走马上任。化名“王庸”担任了特科的情报科长，并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给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当副手，主持特科日常工作。每当顾顺章因事外出时，就由陈赓代理职务。后来顾顺章调离特科，陈赓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成为特科主要负责人。

从 1928 年 4 月起，年轻的陈赓在上海开始了与国民党特务和叛徒内奸日夜斗争的峥嵘岁月。

周恩来慧眼识英才，陈赓出任情报科长

中国共产党在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隐蔽战线上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生死搏斗，被港台史学界称之为“无声的智慧之战”。它以打入对方心脏，及时掌握情报，摧毁对方的组织与行动为目的。因而，它不仅较公开的武装冲突更为尖锐复杂，而且也被罩上了极其神秘的色彩。而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来看，和国民党进行这种针锋相对的艰巨斗争，双方的条件是极不均等的。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全国性的政权作后盾，而等待中共中央特科人员的却是密布各处的军警宪特网络，以及随时都可能出现的被捕和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又要完成不断出击的任务，还要精心设计事发后的自我保护，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谍报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所以，被誉为中共在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曾经说过，应该由最好的共产党员去干这个最艰苦、最困难的事情。

作为了解敌情的情报科，无疑是特科的“千里眼”、“顺风耳”。周恩来慧眼识英才，认定担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非陈赓莫属。陈赓以他的坚定可靠和勇敢机智，表明他充分具备这方面的

品格和才能。他思虑周密，灵活果断，在早期就已隐隐现出大将之风。周恩来对此十分了解，所以，他不仅把拿着照片到码头迎接前来完婚的邓颖超的事都交给陈赓去办，而且早在特科成立的一年之前就派他去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为日后他的情报科长生涯埋下了伏笔。

那是在 1926 年 9 月，陈赓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誓师以后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调派他去苏联学习的通知。他秘密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找中共中央报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和陈赓谈了话。几天后，在杨树浦码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强把他与一同去学习的顾顺章以及绰号“改造博士”的陆留用小舢板送上了一艘苏联货轮。船到海参崴，他们稍作逗留，即乘火车转往莫斯科。因为要保密，他们被安排住进一座大楼，不让上街。十几天后，办好了有关手续，立即离开莫斯科回返苏联远东地区，在苏联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3 个月后才回到上海，又转赴南昌、武汉。1927 年 3 月，陈赓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并实际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承担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已经开始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陈赓到特科工作后，首先着力于情报网的建立。他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打进国民党机要部门，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取情报；在国民党专门的反共机关建立反间谍关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终于建立起一个密布上海的情报网。由于他出色的情报工作，在相当一个时期导致了中共中央特科的无往不胜和国民党特工机构的屡次失败。

这个时期，陈赓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因为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聚少离多的夫人王根英才搬来和他住在一起，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密交通。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每次都必须选择出路较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仅从 1929 年到 1931 年的两年中，陈赓就搬过 5 次家，先后在霞飞路、辣斐德路、保定路等地住过。自幼生长在上海滩的王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细心巧妙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行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他们的孩子知非逐渐长大后，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陈赓是国民党高价抓捕的“要犯”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尽管如此小心谨慎，有时仍然出现意外的情况。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底下。知非 3 岁时，有一天独自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英租界的一个印度巡捕（也就是上海人常叫的“红头阿三”）身上挎的枪，便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知非，紧跟到了家门口，正好遇到王根英出来找孩子，便问她：“你家有枪吗？”聪明的王根英立刻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秘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看到王根英的神态从容、自然，巡捕只好悻悻而去。

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不但经常变更住址，还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分，变换自己的形象。幸好他自幼擅长辞令，会说很多方言，又在学校里演过戏，扮演过各种角色，颇有些表演才能。于是，他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也就不时改换成各种“角色”，时而西装革履，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

脚”有时长袍马褂 礼帽缎鞋 又是富商大贾的模样。陈赓平常爱穿长衫 有时到工厂里工作 又改穿工人服。当时在冯玉祥西北军张自忠师任参谋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曾经回忆起 1930 年在上海同陈赓见面时的情景，他说：“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 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 裤腿用黑缎带扎紧 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一进门便高声招呼 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 诙谐善谈。我先听说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 问他伤势是否严重 伤口是否复原。他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纵情跳跃，一会又下蹲曲腿 显示他的伤腿已经彻底痊愈。我们交谈彼此间的见闻和感受，十分和谐。”几句话间，陈赓的性情跃然纸上。

陈赓用兵 常以奇胜 在特科时也是如此。他长年置身龙潭虎穴 在错综复杂而极其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中 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远远躲开，反倒堂而皇之地迎上前去，公开和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的沉着机敏 特务对他不仅没有怀疑 反而认定他也是某个特务系统的人 是“自己人”不仅丝毫未想到去探究他的真实身分 反倒颇为佩服这个豪爽机灵的青年干才 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老王”或“王大哥”。陈赓的这一着儿非常厉害 特务万万想不到他们悬赏捉拿的中共要人陈赓 竟敢朝夕活动于他们中间。陈赓也就是利用这种心理 以公开的活动成功地掩护了自己的秘密身分。那个时期 不论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场所，还是外国租界的巡捕房，必要时陈赓都可以随时进出 有如家中。

1928 年 9 月的一天，中共地下组织利用法租界的天龙戏院开会 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 不料 30 多个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恰巧也在这里参加会

议 看到突然闯进来的特务和包探 灵机一动 主动迎上前去 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充当把门的“蟹脚”独自把守着一个出口。乘着混乱之机，悄悄放走了不少他认识的共产党员。

就在这次遇险中 陈赓还机智地营救了刚到上海素不相识的中共党员奚李元，当时，奚李元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兵运工作 因一口云南话被特务盘查纠缠 苦于无计脱身 陈赓用暗语试探 判断他是自己人 便上前解围。这个奚李元 便是日后名扬东三省的抗日名将周保中。更巧的是，20年后 陈赓率第四兵团进军大西南 又与周保中在云南重逢 分任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再度亲密共事。述说当年情由，不免大笑不已。

1933年3月，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作战负伤，潜回上海治疗，为叛徒发现被捕。当他被押入老闸捕房、带到政治部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面前时 这个老牌英国特务不禁惊叫：“怎么 你是陈赓 你不是王先生吗？”那些包探、特务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绞尽脑汁多年没有抓到的“共党要犯”陈赓 却正是终日与他们混在一起的“王先生”。

陈赓在同特务周旋的时候 不但具有最大的勇敢 也表现了最大的机警。他经常单枪匹马 冒着极大的危险 深入敌人的心脏 严厉地惩治那些背叛中共、危害革命的叛徒。陈赓的活动 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都是既痛恨又害怕，千方百计地想捕捉他、杀害他。为了获取陈赓的头颅 特务们曾悬出了巨额的赏格 可就是无法找到他的踪影。实际上 那时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之中 他们却始终没有发现他姓陈，就是他们日夜谋算要抓获的那个共产党人。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陈赓依靠地下党组织 通过各种社会关系 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目特务 甚至还掌

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的人。由于陈赓和特科的其他成员在已经夺取的阵地上不断扩大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党部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租界里的包探和巡捕房当中，到处都有特科的人和同情者，或者有被特科所利用的关系在活动着。这些人随时能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际动态等各个方面，为特科提供非常及时而有价值的情报。有了这样多的三教九流关系，不仅消息灵通，而且时常能办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党员乘电车外出，身上带的重要文件不慎被窃。陈赓就利用流氓里面的关系去找，结果不出两天，就把文件搞回来了。

在陈赓建立的密布上海滩的情报网面前，连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和情报机关也对共产党的渗透能力感叹不已。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 在其所著的《暗斗》一书中说 中共“对于渗透工作亦极注意 所派人员 常能利用机缘 占据要津或者掌握机要，随时向特工总部通报消息”。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编印的《共匪的特务工作与保密工作》一书中称：“上海公共租界和租界刑事侦察人员，均有被中共金钱收买的，此类被收买者，对我们破案照例会同办理，往往于到达搜捕目的地时，逮捕对象早已逃逸 均为被收买人员事先通风报信。”

这个时期 陈赓通过这一系列关系 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许多任务。在艰苦的条件下，其中有些事情完成得十分出色。这些轰动一时的成功，固然与各方面的因素有关，与先后在情报科工作过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强、陈寿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人的共同努力有关，但陈赓的有力领导无疑起了决定作用。这些，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以及在白色恐怖下的坚定乐观和对自己战友始终诚恳相待

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就像他后来任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时一样，他对下级不但信任，而且能够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工作，一旦遇到困难，就和他们一起协商解决。这种出色的领导素质，使得他在当时那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如鱼得水，能够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1930年6月，由李立三左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总暴动计划。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有出海口，又有共产党领导三次武装暴动的经验，中共中央自然也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陈赓临机受命，领导情报科挑起了调查西方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的重担。当时人手不够，他就领着刚从苏联回来的刘鼎和刘大汉进行侦察工作。后期调查上海租界军警团的情况需要外文人才，他们还特地请求上级又派来一位姓龚的女士和一个姓魏的党员来协助工作。为了调查外国驻上海的舰队情况，他们恨不得爬上每条军舰去看看上面到底有多少炮位。列强规定军舰附近不准船只来往，他们毫不灰心，打听到长途舰船可以在军舰附近通行，就搞来一条大船伪装成长途船只，由自己人亲自驾驶到军舰附近去侦察，终于逐一地查清了全部情况。他们还设法搞到了吴淞炮台的地图。为了查清外国兵营驻军的准确数字，他们派人在兵营门口摆摊，留心观察每天进出人员和运进物资的情况，并把每天运进多少粮食、多少蔬菜等逐项登记，然后凑在一起综合分析，推算出外国驻军的约数。不知道监狱里关有多少犯人，他们就悄悄地爬上监狱附近的教堂屋顶，把监狱中的全部屋脊绘成草图，然后根据屋脊算出房屋的使用面积，再根据牢房里的人口密度，推算出关押犯人的约数，真是绞尽脑汁。在调查上海的街道和建筑物情况时，他们把

项目分得十分细致，连建筑物的层数、结构和质量，以及街道如何交叉、外滩每幢大楼有多高、各楼间的距离有多远等，也都作了精确的探测，为巷战和炮兵射击提供了各种数据。甚至连暴动后怎样才能控制上海的金融商业市场，他们都考虑到了。因而对各大银行和商号作了详细的调查，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情报科把国民党驻上海的军警及特务机关的情况连同这次侦察得来的各种情报，汇集成一大厚本资料送到了当时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刘伯承那里，为准备发动的武装暴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情报。直到解放后，长期担任陈赓直接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还记得此事。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陈赓和刘鼎，同他们谈起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时，刘伯承仍然认为：“不过我们的共产党员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们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来说，那也真不简单哪！”

这次上海暴动，虽然由于各地连续的失利和立三路线的很快被纠正而流产，但对于陈赓领导的情报科来说，却不啻是战斗力的一次全面考验。他们的答卷十分出色。

中共特科负责人，在火车上 与国民党警备司令狭路相逢

陈赓的沉着干练和足智多谋，使直接领导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对他备加信赖，处理问题总爱征询他的意见。

1930年春的一天，周恩来拿了一张照片交给陈赓，问：“你看这人是谁？”

陈赓一面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

镜的人，一面在脑子中过电影似地搜索着各种人的形象。

“是黄埔军校的！”周恩来又提示了一句。

“想不起来！”这个有名的机灵鬼为难了。

“哈哈 就是我！”周恩来像小孩子搞了恶作剧 忍不住开怀大笑。

“嗨！化装照！”陈赓恍然大悟：“干什么用？”

“我要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要办出国护照，担心被敌人认出来。现在放心了，连你这个在身边的特务都没认出来 可见万无一失了！”周恩来兴奋不已。

1946年9月 周恩来同采访他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谈到此事，还非常赞赏地说，由于陈赓“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照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这仅是一件小事。当时，许多艰险的任务，周恩来总是交给陈赓去办。

1961年初，陈赓因心肌梗塞，乘专用车厢南下上海休养。上海曾是他长期坚持秘密斗争的城市，给他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火车离开北京，58岁的大将心潮澎湃 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车？……这是花车，是阔佬要人们乘坐的。那时我只能坐得起普通车厢、三等客车。”素来不喜宣扬自己的陈赓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故事，这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幸能够了解这段传奇经历。

那是在20年代末，为了改变中共顺直省委屡遭破坏的状况，周恩来派陈赓去天津酌情建立一个特科性质的组织，这项要使命曾使陈赓陷入非常危险的处境。

那次，他从上海乘火车启程，行经南京停车的时候，陈赓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转悠，突然发现车后临时挂上了一辆专用的花车，扭头又见国民党的几个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他是黄埔军校的“老资格”，在国民党军队黄埔系将领中广为人知。他怕遇上熟人，赶快跑进车厢，把帽子拉得低低地坐下。哪知车行不久，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到陈赓面前。

“陈先生，我们钱军长有请。”

陈赓一听，就知道被原黄埔教官钱大钧盯上了。钱大钧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又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在叶剑英负责的教授部任中校教官。陈赓上黄埔一期时，钱大钧曾教过他们兵器教程，东征中又任黄埔学生军参谋长，同陈赓颇有些“师生之谊”。国共破裂后，钱大钧任二十师师长，率部阻击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双方发生会昌激战，而陈赓时任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就在此役中，陈赓左腿负伤，险些丧命。后幸得长汀名医傅连暲，后加入红军，建国后授衔中将，精心医治，否则那时就要被截肢了。1928年，钱大钧率所部三十二军进驻上海，并兼淞沪警备司令，这与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陈赓更是直接对手。被他盯上，还有什么好事？陈赓听完来人的话，连眼都没睁，一动不动，就像这话不是对他讲的。

“陈先生，我们钱军长请你到他那里去坐坐！”话被以更大的音量重复，说话人的身体也俯向陈赓。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根本不认识什么钱军长！”陈赓沉着地抬头看着来人。

那人不知底细，只好离去。但不一会，他又回来邀请，陈赓仍执意不动。

“哈，我没认错吧！快到我的车厢里坐坐！”被那群军官簇

拥着送上花车的，果然是钱大钧。他竟亲自来请了。这位军长大人掀开陈赓的帽子，不由分说地挽起他就走。

“你们看，我捉来一个活共产党！”钱大钧安顿陈赓坐下后，兴高采烈地对同行讲。他狡黠地看着陈赓：“我一进站就看见你了，叫副官跟上你的。”

“我早就不干了，现在做点生意，准备找胡宗南去想点办法。”陈赓微微一笑，表现非常轻松。胡宗南也是黄埔一期的同学，现正任第一师师长，驻防河南，正在此行的前方。

“怎么，你改邪归正了？”钱大钧哪里肯信。

“谈不上改邪归正，共产党嫌我落后，不要我了！”

接着，陈赓有意把话题扯到黄埔的往事，以引发对那些共同生活的黄金岁月的追忆。

“那次校长遇险，多亏你搭救，还帮了我一把。”钱大钧果然提起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被叛军包围，到处找不到担任警卫的钱大钧第三团，气得他直骂娘。第二天，蒋介石已被救出险境，钱大钧才赶到。当时，蒋介石火气很大，要对钱大钧发作，多亏陈赓在一旁替他解脱，说他怎么艰辛地找了校长一夜，足见对校长是很忠诚的，这才使钱大钧免遭惩处。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到符离集了，买烧鸡吃，买烧鸡吃，这里的烧鸡可是有名的！”陈赓见目的已经达到，故意表现得毫不介意。

吃着烧鸡，陈赓一面同钱大钧等人天南海北地瞎扯，一面思谋着脱身的法子。

列车驶进徐州站，陈赓站起身，向钱大钧告辞：“我该在这里下去换车了。”按他说的找河南的胡宗南，确实应该在这里下车，换乘陇海路的车。

陈赓在人丛中转了几圈，偷偷地又钻进一节离钱大钧很远的车厢，又把帽沿压得低低的坐下。

列车又开动了。

“陈先生没有下车啊 我们军长请你去！”又是那个副官的声音。只见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情。

陈赓壮着胆子，又去了花车。

“你在我面前搞鬼 你说你不干了 我还不了解你 你是不会改变的！”钱大钧一见陈赓就说。他在陈赓下车后一直派人跟踪在后。

“唉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干也不会被重用。不然的话 早让我掌握兵权了，而现在只落得四处漂流。”陈赓含糊其辞地顺水推舟，一副不得志的样子。

“你安心坐你的车吧 念在黄埔的旧情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不过，我劝你还是收敛些，校长很注意你，被他发现就不好了。”钱大钧似乎很恳切。

“嗨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还能信不过你！”陈赓见他并不认真 就避开他的话题 尽同他打哈哈。

车到天津，钱大钧果然没有难为他。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留下深刻印象。火车行驶地区，均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防区以外 钱大钧乐得睁一眼、闭一眼作个人情。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蒋介石确实很关心他的情况，钱大钧也不敢多加纠缠。加上陈赓那副似是而非的态度，使他虽有怀疑，但确实没有弄清他的真实身分。何况，陈赓对他还有过那件并未被遗忘的恩情，所以，他也就网开一面了。

两年之后 陈赓即转到苏区 身为红军骁将打得国民党军和

他的那些老同学们闻风丧胆，不知当时率部“围剿”红军的钱大钧闻知后作何感想。

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驻沪特派员， 竟是陈赓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情报科成立之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陈赓深深懂得，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只在敌人面前打“外围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入敌人的侦探机关，掌握核心秘密，才是反击其破坏阴谋的最有效的隐蔽斗争手段。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陈赓为二科制定了一条“打进去”与“拉出来”相结合的行动方针。结果，情报科创造了震惊上海和国民党中央特务指挥机关的奇迹。其成功之巨，在世界情报史上也属名列前茅。

其成功之一，是在 1929 年派遣情报人员钱壮飞打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并成为这个国民党中央最高特务机关的头子徐恩曾所信赖的机要秘书。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条件，周恩来和陈赓又把情报科的李克农、胡底调到南京与钱壮飞配合，多方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特工等情报，使中共中央能及时掌握国民党全国特务机关的活动。这三位杰出的情报人员深入虎穴，凭着赤胆忠心和机智勇敢，在这场国共双方的隐蔽斗争中演出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尤其是 1931 年 4 月及时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使中共中央机关避免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们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这其中，无疑也有着陈赓的一份贡献。

其成功之二，是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派驻上海的特

派员杨登瀛吸引到特科的直接领导之下，从而控制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

在上海 要打入敌人的侦探机关 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国民党的警、宪机关和党部，另一个是西方各国在租界设立的巡捕房。钱壮飞等人主要属前者，并在其上层核心机关活动，而杨登瀛则两者兼而有之，既在基层掌握一方地盘，又与巡捕房关系密切。他是陈赓经过调查研究后，在国民党专业的反共领导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为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控制上海的侦探机关打开了局面。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自幼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中学，又从早稻田大学毕业，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他精通日语，交际能力特别强，交往既广阔，也很复杂。他在日本的报界和商界中交了不少朋友，同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很熟悉，与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来往密切，和青红帮也混得相当熟。同时，他也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所认识。他当过日本洋行的职员，五卅运动时常去总工会，还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四一二”时，杨登瀛曾被蒋介石逮捕，后由国民党人保释出狱。他在五卅运动中结交的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是他的同乡兼挚友。此人不久投向国民党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1928年初，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筹建党务调查科时，常到上海来策动反共工作，同杨登瀛无话不说。

1928年3、4月间，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南京建立总部后，杨剑虹被派到上海来筹建特务组织，有意吸收杨登瀛入伙。时值共产党员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回到上海，住进了北四川路的杨家。

陈养山是浙江上虞人，生于 1906 年。1919 年到汉口当店员，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参加组织五卅运动。1928 年后，他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保卫工作，是特科的得力干部。1931 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又与陈赓一起被周恩来派到天津开辟特科工作。从 1931 年 9 月起，先后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1940 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党校支部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署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顾问。1991 年 2 月在北京逝世。

陈养山在争取杨登瀛的工作中起了关键性的牵线搭桥的作用。陈、杨两人早在 1925 年底就已认识。杨登瀛此时思想上很矛盾，别的事尚可做，但要当侦探，若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那么既可以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与共产党为友，何乐而不为？经过反复考虑，杨登瀛把杨剑虹两次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查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当局拉关系等情况，全部告诉了陈养山，并表示如按他的“两全之策”办，则愿将所了解的情况供给中共。

陈养山感到此举很有价值，便按所属的中共江苏省委之嘱，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建议和杨登瀛建立特情关系。不久，陈赓即找陈养山谈话，多方考察了杨登瀛的情况。中共中央对此事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样一个人在政治上虽然不很可靠，但

是在隐蔽斗争中是很需要的，特科正要在这方面大力开展工作，于是经周恩来同意，陈赓便于1928年5月与杨登瀛见面，长谈5个小时。半个月后，陈赓又找杨登瀛商谈，并确定陈养山调情报科工作，改派连德生和杨登瀛单线联系。从此，杨登瀛便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这样，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控制下进行工作。陈赓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陈赓的一步步指导下，从1928年5月到1931年4月的3年中，杨登瀛逐步提高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地位和能量，不但为中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同时也深为国民党所器重。

根据陈赓的指示，杨登瀛开始时先在他的顶头上司中间周旋，极力拉拢陈立夫、张道藩，通过建立私人友谊，以博取他们的好感和欢心。陈立夫、张道藩每到上海，都同杨登瀛吃喝玩乐，搅到一起。杨登瀛同张道藩之间，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曾有一个政敌同张道藩过不去，杨登瀛便应张道藩之求，为他除掉了这个政敌，张道藩才得以在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后，爬上调查科第二任负责人的高位。为此，张道藩对杨登瀛十分信赖，有求必应，成了他在国民党上层中的庇护者。

与此同时，对直接负责他工作的党务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杨登瀛则按陈赓的叮嘱，不露声色，驯服地听从他的指挥，出色地完成他指定的任务。陈赓深知，狡诈的杨剑虹虽然选定杨登瀛在上海负责建立特务机关，但对这样的部下他还是放心不下的，还在进行试探。

1928年5月，杨剑虹突然带杨登瀛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巡捕房派人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事先却